

從微觀史到全球史： 沈艾娣教授訪談（上）

●張 寧

編者按：由於篇幅關係，本刊將分兩期刊出文章，本期先刊出第一至二節。

英國歷史學家沈艾娣 (Henrietta Harrison)，現為牛津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系教授，主要著作包括：《政治儀式與近代中國國民身份建構 (1911-1929)》(*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2000)、《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人生 (1875-1942)》(*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1875-1942*, 2005)、《傳教士的詛咒：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 (1640-2000)》(*The Missionary's Curse and Other Tales from a Chinese Catholic Village*, 2013)，以及《翻譯的危險：清代中國與大英帝國之間兩位譯者的非凡人生》(*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 The Extraordinary Lives of Two Translator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the British Empire*, 2021)。

2022年5月至2024年6月，筆者以英國學術院 (the British Academy) 牛頓國際博士後 (Newton International Fellow) 的身份，在牛津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系進行有關參加緬甸共產黨軍隊的中國志願者的歷史研究；沈艾娣是筆者的合作導師。沈教授不僅在學術研究上碩果累累，同時也承擔了很多教學與教務管理工作。她嚴謹的工作態度，以及對學生因材施教的指導方法，令筆者及其他受教的青年學子受益良多。隨着《傳教士的詛咒》、《翻譯的危險》中文版的面世，沈教授已接受過不少學術訪談，筆者這次訪談則從一個年輕學者的視角出發，圍繞沈教授的教育背景和研究旨趣、寫作方式、對於青年學者的建議以及其最新課題進行提問。訪談分兩次展開，對於每一個問題，沈教授都給予了真誠而謙虛的回答。她不僅回

顧了個人學術生涯與研究經歷，也提出了她在長期教學、輔導以及管理工作中生發的一些思考，還分享了自己探索兼具專業性與可讀性寫作風格的經驗。最後，沈教授着重介紹她最新的學術研究課題——關於1949年前後中國社會的諸多思考。沈教授也在訪談中提到了許多優秀的歷史學者與歷史作品，本文也加以整理，以饗讀者。

一 教育背景與研究興趣

張寧：非常感謝您接受我的採訪。在您的最新著作《翻譯的危險》一書中，大家都注意到您深厚的西方古典學修養。請介紹一下您的教育背景和學術經歷，以及如何對中國研究產生興趣，您的教育經歷又是怎樣與之後的學術研究方向結合起來的。

沈艾娣：我在倫敦長大，就讀於聖保羅女子中學 (St Paul's Girls' School)。我十歲開始學習拉丁文，十四歲學習古希臘文。這所中學當時很重視自然科學，鼓勵更多的女性投身科學，成績優異的學生都會選讀數學、化學和物理學。當時學校裏只有三個初中生選修古希臘文，其中兩個不想在高中繼續研讀，但學校很希望有人讀下去。所以，我在高中就選擇了拉丁文、古希臘文和物理學。高中畢業後，我入讀劍橋大學繼續唸古希臘文與拉丁文。在劍橋，我遇到了古典學專家比爾德 (Mary Beard)。現在她在英國很有名，經常出席一些電視節目，介紹古羅馬歷史。她深受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而我個人比較難以接受這種新思想，所以決定轉而學習中文，這樣可以多學一些語言，避開後現代主義的問題。

最初我對中國幾乎沒有甚麼深入了解。選擇中文是因為我喜歡詩歌，阿拉伯語和中文的詩歌都很優美。我很喜歡林語堂寫的《蘇東坡傳》(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 1947)。我的家庭裏，只有祖父曾去過中國。他出生於1901年，十二歲就參加了海軍。1920年代，他隨着英國軍艦到達揚子江，當時只是一個小軍官。他們的軍艦曾去過上海、鎮江、重慶等地，以確保英國在華僑民及其經濟利益的安全。1927年國民革命時期，土匪猖獗。按照英國政府的規定，他們不能開槍，於是就用高壓水槍來對付土匪，土匪看到後大笑離開。他很少提及在中國發生的故事，直到我開始學習漢語，才發現他會說一句中國話「好不好」，那時我才了解到他的這段經歷。

劍橋畢業後，我拿到了肯尼迪獎學金 (Kennedy Scholarship)，去了美國哈佛大學讀東亞區域研究碩士。我在哈佛學習了一年漢語，然後在1990年到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學了一年。我從台灣回到哈佛後，又學了半年漢語，但還需要注音符號才能閱讀。

張寧：據我所知，不少中國學生對於海外漢學家的中文名字來歷很好奇，有些人的名字背後有些很有趣的故事，您的中文名字有何來歷？

沈艾娣：很多人曾問過我有關我中文名字的問題。Henrietta 在英文裏是一個很長的名字，小時候大家都叫我 Hetty。後來到了台灣，我說叫我 Hetty 就可以了。當時和我做語言交換 (language exchange) 的女生建議我取一個中文名字，我說只需要最簡單的音調以及女性常用名，於是她便幫我選擇了南方女孩子常用的名字「艾娣」。我在山西做訪談的時候，老一輩的婦女聽到我的名字後便會問我：「你父母是不是想要一個兒子？」我只能笑着告訴她們，我們家有四個女兒，我的父母比較傳統，說不定他們想要一個兒子。

張寧：我認識的一些沒有中文基礎，但因研究課題而開始學中文的牛津青年學者，他們正經歷着學習中文的挑戰。您是如何克服語言問題的？

沈艾娣：我的中文水平提升是從閱讀研究所需的文本開始的。我在牛津大學讀博士學位，導師科大衛 (David Faure) 教授來自香港，他有很多香港學生例如程美寶、張瑞威，此外還有宋怡明 (Michael Szonyi)、柯麗莎 (Elisabeth Köll) 等。他們的中文都很好，這給了我很大壓力。科大衛教授收藏有很多書，有時我去見他，他會給我一本書，說「你晚上睡覺之前看這一本」，事實上我需要好好地讀才看得懂。此外，杜德橋 (Glen Dudbridge) 教授也一直督促我提升中文水平。

張寧：您剛進入中國研究領域時，是如何找到自己的研究題目的？您提到在劍橋的時候並不喜歡後現代的思想，但您的博士論文，也是您的第一本書《政治儀式與近代中國國民身份建構 (1911-1929)》卻借鑒了後現代主義思想。

沈艾娣：當時我關注的是民國儀式問題。我在台灣師範大學的時候，台北市政府舉行祭孔儀式，允許師範大學學生參加。我參加時感覺很新奇，那是早晨4點鐘，非常正式隆重：他們真的準備了祭祀用的豬和牛，當時還有日本的外交官參加。我一看到這些儀式，就想到了後現代的「慶典」(ceremony) 與「象徵」(symbol) 這兩個重要的概念。於是在申請讀博士的時候，我擬定的題目便是關於中國的禮儀問題，而科大衛教授對中國的傳統禮儀很感興趣，所以收我為學生。

由於後現代主義學者過於熟悉這些概念，他們很容易忘記這些概念對於普通讀者而言是多麼難以理解。我的書雖然借鑒了當時西方最新最流行的思想，即比爾德的古羅馬史的後現代主義思想，但我的寫法 (writing style) 和他們不同。我一直喜歡寫能看懂的歷史書。在資料方面，科大衛教授對於史料有非常豐富的知識，他指導我應該看甚麼史料。這兩方面促成了這本書。

張寧：據說您的每一本書都是長達十年的項目。在《政治儀式與近代中國國民身份建構(1911-1929)》後，您寫了一部微觀史《夢醒子》。這本書呈現了一個底層鄉紳劉大鵬如何努力在一個變動的時代踐行儒家傳統，把寫作與反省作為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您將劉大鵬還原為一個真實的人，而非概念性的人物。這本書跟您第一本書的風格很不同。從這本書開始一直到《翻譯的危險》，您似乎確立了這種「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寫作方式。您是怎麼探索出自己的寫作風格的？《夢醒子》這本書很受中國讀者歡迎，它在西方讀者中的反響如何？據我所知，這本書一直是暢銷書。

沈艾娣：我從開啟一個新的研究，到最終出版成書，每本書跨度大概十年。《夢醒子》一書是我的博士後研究題目。當時，我想研究「妾」(concubine)在上海的歷史，可是科大衛教授接觸到《退想齋日記》後，建議我寫劉大鵬。我和他辯論了好幾次，他還是認為研究劉大鵬更有價值，我就聽從了他的意見。我通過他的關係和山西社會科學院張正明教授的幫助，在山西省圖書館看到了劉大鵬的日記手稿^①。我拿到了牛津大學聖安學院(St. Anne's College)的獎學金，做了兩年的博士後研究，之後又得到倫敦高校中國委員會(The Universities' China Committee in London)兩年的資助，所以一共做了四年的博士後研究。

至於為何會選擇這種寫作風格，一是看一個人的日記，感覺像是認識這個人；二是我記得曾告訴過達文(Delia Davin)^②，我要寫自己喜歡看的書，以及我尊敬的人會尊重的書。我從小喜歡看歷史小說，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曾說過，唯一的歷史問題，也是最重要的歷史問題，是「過去是怎樣的」(What was the past like?)。我覺得這是歷史學最有趣的地方。對於《夢醒子》這本書，科大衛教授希望我寫成一部傳記，但我希望呈現自己的論點。這本書的主要購買者是美國讀者，講述個人故事的書是美國學者教授中國歷史時常用的一類書。一般來說，在一門課裏，他們會讓學生看一本教科書，然後還有一些理論方面的書，以及一些比較活潑的書。這本書篇幅不太長，是作為比較活潑的書被推薦的。我當時沒有在美國教學過，並不知道這個情況。

張寧：近年來全球史方興未艾，您的第三本書《傳教士的詛咒》又是另一種風格。這本書將山西省洞兒溝村放入全球史的框架裏，講述一個重要又連貫的故事，被認為是微觀全球史的典範。您是如何發現這個題目的？這本書與您之前的研究有無關係？您在該書中文版序言裏寫道，一些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者認為您這本書，旗幟鮮明地反對以往在「文化適應」的主題下研究中國基督教的通行做法，而是更重視基督教與中國認同、本土化與全球化之間的張力、互動與演變。您會希望藉由自己的研究樹立研究中國歷史的新範式嗎？

沈艾娣：我在山西做田野調查的時候，張正明教授提議帶我去看我感興趣的地方。我當時對兩個新的題目感興趣，一個是劉大鵬日記裏提到的小煤窯，另一

個是日記裏提到的天主教村的「教匪」。他們覺得煤礦問題比較敏感，所以帶我去了天主教村。這個村叫洞兒溝村，離劉大鵬所居住的赤橋村只有十公里。它雖然是一個很普通的華北農村，但有一個歐式教堂。教徒那天晚上都去教堂做禮拜，這也很「歐式」。大部分中國村莊的現存資料都不足以支撐一個敘事連貫的歷史研究，洞兒溝村的特殊之處是歐洲傳教士與中國神父來往很早，而羅馬保留的相關資料很豐富，我又懂拉丁文。赤橋村根本沒有這樣的歷史，所以洞兒溝村對我而言是個驚喜。此外，科大衛教授很重視口述史，他建議我去做訪談。村民講述的村莊歷史，肯定跟檔案所講述的歷史大不相同。

在蒐集材料方面，到意大利、梵蒂岡等地尋找檔案資料，對我而言並不如中國人想像得那樣困難。傳信部的檔案中，有關中國的檔案是按照中國各地的書信歸類封存的。我按照人名，看了傳教士與中國神父從1736到1874年的書信。當時感覺好像在看一部小說，這些人年輕時積極熱情，隨着歲數增長、身體變差，他們開始變得悲觀且時常埋怨。有一個很可憐的傳教士就發瘋了，在小小的紙張上寫得亂亂的，我會被這種細節感動，也就想把它們寫到書裏去。所以說，我一開始並沒有考慮範式問題，也並沒有甚麼世界史與全球史的想法。我只是喜歡閱讀史料，對山西的農村感興趣，只想寫一本山西農村的歷史。但是，發現了這些資料，就意識到這不僅是一部中國內地農村史，還是一部全球史。

張寧：《傳教士的詛咒》一書中有很多關於宗教的專有名詞與知識，這需要很深奧的神學知識。有些讀者好奇這個研究與您個人的宗教背景是否有關係。

沈艾娣：這本書與我拉丁文的語言能力有關，與我的宗教背景無關。外國人寫中國歷史，不可能像你們一樣閱讀那麼多中文資料。可是這些拉丁文的資料，對你們來說也不容易讀。我是用這些新的資料對中國史學界做一些小貢獻。有些人因為此書，誤以為我是天主教徒。我是基督徒，所以對神學比較了解，也比較感興趣。學者的宗教背景會影響他們對相關研究的看法。一個真正信仰天主教的學者很難寫出《傳教士的詛咒》這本書，他們不會喜歡村裏有這麼多關於聖迹顯靈的故事，覺得這些東西很落後。我認為面對宗教話題，應該開放一些。

張寧：《夢醒子》是關於劉大鵬一個人的歷史，而《傳教士的詛咒》是一個村莊的歷史，裏面並沒有很顯著的、需要突出的人物。《翻譯的危險》則選擇了兩位翻譯家，細述他們的個人史以及在大歷史中扮演的角色。您是如何選擇小斯當東（George T. Staunton）與李自標這兩個人為敘事主角的？

沈艾娣：在傳信部複印檔案很不容易，我抄寫了很多資料。那些資料都是手寫體的意大利文和拉丁文，看起來也很費勁。我在這些檔案中發現了李自標的書信，原來是打算將他的故事寫進《傳教士的詛咒》，但是發現李自標好像

沒有去過洞兒溝村，所以完全放不進去，我覺得相當可惜。我跟哈佛大學歷史學者羅斯柴爾德 (Emma Rothschild) 談了李自標的故事。她說，「你有一個中國人在十八世紀歐洲的資料，這很值得寫成一本書」。當時我已經開始了有關1949年中國的研究〔另見本文下篇〕，於是我說好，我先寫一本有關李自標的小書，結果這本書花了十年的功夫。

我已經寫了有關天主教的書，所以不想再寫天主教歷史，因為一個類似的題目很難產生新的思考。李自標最令人感興趣的是他擔任馬戛爾尼使團 (Macartney Embassy) 的翻譯，所以「翻譯」是一個確定的主題。此外，如果和英國人提到馬戛爾尼使團的翻譯，大家都會說：「不是有一個英國的小孩嗎？」這是英國人對於馬戛爾尼使團最深刻的印象，幾乎每個對中國歷史感興趣的英國人都知道。然後，我就決定把這個小男孩〔小斯當東〕放入故事裏。至於李自標，除了一個專門做那不勒斯與中國歷史研究的意大利學者之外^③，幾乎沒有人研究過他。當然，有很多人研究過小斯當東的父親斯當東 (George L. Staunton)，但是我發現了一些新的資料，特別是有關愛爾蘭經濟方面的。人們一直以為馬戛爾尼是英國人，其實他來自愛爾蘭北部，他的助手斯當東來自愛爾蘭南部。斯當東在加勒比海有一個大農場，這又與奴隸史有關。

張寧：我注意到《翻譯的危險》最後提到何志 (John Hochee) 這個中國人。從書中照片看，這個人着裝就是一個英格蘭紳士的模樣。他們家族的歷史是否值得寫成一本書？

沈艾娣：何志是廣東香山人，英國的薩塞克斯 (Sussex) 現在還有他的石像。在英國1861年的人口普查登記中，何志被稱為一個「紳士」(gentleman)，說他是英國中產階級的一員也沒問題。我猜測他是個跟英國人有聯繫的小買辦，應該與中國政府有一定的矛盾，在1819年跑到英國。後來，他給東印度公司的一個貴族埃芬斯通 (John F. Elphinstone) 的家庭做僕人，但實際上他是大農場的管家，同時也行醫。這個貴族應該有吸食鴉片的惡習，管理家業的能力很差，但何志卻很有辦事能力。何志後來娶了一位英格蘭姑娘。他去世後，他的妻子捐錢建了一座救濟院。他們的子女比較多，兒子在愛丁堡大學讀醫學，還有幾個女兒。他的後代裏有一位名為鄧肯 (Guy Duncan) 的外交官，退休後對於祖先的歷史很感興趣，蒐集了很多資料。鄧肯去世後，他的後代把他的書和資料捐給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 (Bodleian Library)。我在書裏使用的照片就是他們家族捐贈的。當時在英國的中國人並不多，所以何志的故事很有趣，但他的家庭史已經由鄧肯寫過了^④。有關中國人在英國的歷史，有一本寫得很好的書叫《中國人在英國：訪客與定居者的歷史》(The Chinese in Britain: A History of Visitors and Settlers)^⑤，值得閱讀。作者普萊斯 (Barclay Price) 不是大學教授，但他對地方史很感興趣。我查看過他蒐集的這些資料，認為他的研究十分準確，只可惜沒有腳註。

二 給年輕學者的建議

張寧：您在牛津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系有多年教學與課程管理經驗^⑥，您認為向外國學生教授中國歷史的挑戰是甚麼？中國學生來到西方研究中國史有哪些困難？

沈艾娣：一般而言，外國學生遇到的問題主要是語言問題。這個問題不算嚴重，比如說本科生，他們有很多的時間，可以慢慢提升語言能力，不過英國本地的學生很少申請讀中國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反而面臨最大挑戰的是中國學生。首先是英文寫作的問題，其次是文化問題。就做研究而言，中國學生可以讀海量的資料，我們比不上他們的閱讀量。但是，做研究不只是讀資料，讀資料是最基本、最容易的，寫作才是思想的表達。此外，在英國教授中國歷史、發表與出版學術成果，還需要了解西方的思想與文化。讀博士可以看作是找工作的培訓；在西方教書的老師，不僅要能夠用英文寫作，而且也要從事行政與管理工作，因此要想在西方教書，需要了解西方的思想與文化。

另外，中國學生注重與中國學術界進行對話，這一點很好，但他們關心的問題或許不是西方讀者關心的。比如說共產主義，對於中國大陸讀者而言，是個懷有美好初衷的思想，如同很多西方人看待宗教一樣。但是對於一般的西方讀者而言，共產主義是冷戰時期的負面思想。這樣的話，寫1949年之後的中國歷史就比較複雜。因此，學者需要向讀者解釋——有的人因為認為共產主義有好的地方，所以才參加共產主義革命。讀者的政治背景很重要，研究者需要學會站在讀者的視角來寫作，這一點對於中國學生而言會顯得很困難。

張寧：您剛才提到了在英國學習的中國學生遇到的挑戰，不單單是語言問題，還有中西文化差異問題。您覺得在研究中國歷史時，跨文化視角有多重要，您如何在研究中融入這種視角？

沈艾娣：「西方」並非一個西方，「中西」中的「西方」也是一樣。因為語言相同，英美有一個共同的學術界。如果說到法國，那是另一個學術界。英美學術界與法國學術界的差別，與英美學術界和中國學術界的差別差不多一樣大。其實不單單是文化問題，還有政治問題。

回顧學術與歷史發展，每一代人與學者都對時代有特定的貢獻。比如說婦女史的研究是伴隨着二十世紀婦女運動開始的。當時的學者寫了很多內容新穎且重要的婦女史著作，而十九世紀的學者不會對婦女史感興趣。我們從自己的社會來看中國史，會投射我們對於自己社會的一些關切。如林郁沁 (Eugenia Lean) 寫的《施劍翹復仇案：民國時期公眾同情的興起與影響》(*Public Passions: The Trial of Shi Jianqiao and the Rise of Popular Sympathy in Republican*

China)，有關1930年代上海新聞界對於一個名為施劍翹的女子為父親復仇的反應^⑦。這個題目與當時的西方新聞界有一定關係，大眾會談論民粹主義的興起以及報紙能否宣傳民粹主義，這是否會對社會造成不利影響。再舉一個例子，我知道中國政府可能不太喜歡「新清史」，但是很多「新清史」著作是美國學者從關心美國問題的角度出發的。民族問題是美國一個重要的歷史問題，所以美國學者看中國，自然會對民族問題感興趣，會選擇有關少數民族的題目。所以說，各國有各自的情況，有自己的歷史、政策和辯論的話題，我們研究過去會帶有後見之明，但寫歷史不應該是由「目的論」(teleology)主導的。如果寫一部「目的論歷史」(Teleological History)，我們會忘記歷史也有不同的可能性。如果寫一本書關於中國共產黨為何會贏得政權——我們可能會忘記1947到1949年存在許多不確定性，例如當時中共的一些將領對能否奪取政權並不完全確定。

張寧：在知識生產與傳播方面，您認為歷史學者承擔着向大眾普及知識的責任嗎？您認為年輕學者如何定位自己的第一本書？比如說寫作風格、目標讀者群體。

沈艾娣：我認為年輕學者的第一本書一般是他們的博士論文。當然要寫一本能出版的博士論文，這不太可能是一本大眾讀者普遍接受的書。我們培養學生，肯定是培養他們寫學術著作，比如說《夢醒子》作為博士論文是不可行的。博士論文是一種考試，主要目的是讓答辯考官知道你有做學術研究的能力。

我在利茲大學授課的時候，只有一個博士生。2006年，我剛到哈佛大學執教時，突然有了很多博士生，急需提高輔導博士生的能力。就此問題，我曾請教歷史學家歐立德(Mark C. Elliott)和人類學家華琛(James L. Watson)。華琛教授的學生覓得美國最好的中國人類學教學工作，這些學生有很多現在很有名，例如閻雲翔。他告訴我，和學生說話的時候，一定不要說「你的博士論文」，必須每次都要說「你的書」如何如何。而歐立德教授是研究新清史的，他認為博士論文是給學生一個機會，用來蒐集大量資料，這些資料都應該放入博士論文。他當時有一個學生謝健(Jonathan Schlesinger)，博士題目有關清代朝貢物品裏的動物毛皮。他的博士論文裏有海量的表格，列舉哪一年有哪一些動物的毛皮。後來，他的博士論文出版為環境史方面的書，這些資料當然沒有放入書中^⑧。不過，讀者如果需要這些資料，就可以去查閱他的博士論文。博士論文可以寫很多字，但專書必須是濃縮的——這是先做一篇大體量的博士論文然後再出書的好案例。再比如，我最近的一個學生白瑞唐(Thomas P. Barrett)的博士論文裏，也有關於清末外交官人名的詳盡表格。雖然日後出書時不可能放入這些表格，但研究外交史的人如有需要，就可以查詢他的博士論文。我還是認為華琛教授更有道理，要跟學生說寫博士論文就是寫書，但這本書是比較傾向於學術界的。

此外，博士生在三五年內寫一篇博士論文，很可能只做個案研究。對於個案研究的方法，中國學者過去都持批評意見，但現在中國學術界也普遍在做個案研究。我認為，一開始選擇大題目做博士論文是不合適的，因為不可能掌握那麼多資料。但是，個案研究對於大眾讀者或許是無意義的。在完成博士論文之後，我認為以大眾讀者為目標讀者進行寫作是沒有問題的。寫一本成功的、以大眾為目標讀者的書，既可以傳遞自己的思想，又可以掙錢，這會影響到年輕學者的選擇。例如在美國的學者王元崇，他的英文書很好讀。同時，他也用中文寫書，寫一些比較大的題目，例如中美關係^⑨。（未完待續）

註釋

- ① 劉大鵬著，喬志強標註：《退想齋日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 ② 達文是最早關注中國共產黨婦女政策的英國學者，其代表作參見 Delia Davin, *Woman-work: Women and the Part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③ Michele Fatica, "Gli alunni del Collegium Sinicum di Napoli, la missione Macartney presso l'imperatore Qianlong e la richiesta di libertà di culto per i cristiani cinesi [1792-1793]", in *Studi in onore di Lionello Lanciotti*, ed. Sandra M. Carletti, Maurizia Sacchetti, and Paolo Santangelo (Napol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1996), 525-65.
- ④ Guy Duncan, *The Lives of John Hochee and John Fullerton Elphinstone, 1788-1854* (private publication, 2003).
- ⑤ Barclay Price, *The Chinese in Britain: A History of Visitors and Settlers* (Gloucestershire, England: Amberley Publishing, 2019).
- ⑥ 牛津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系 (Faculty of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在 2022 年 8 月之前為東方研究系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具體改名經過參見高軼暘：〈牛津大學東方學系更名始末〉（2022 年 10 月 2 日），澎湃新聞網，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097790。
- ⑦ Eugenia Lean, *Public Passions: The Trial of Shi Jianqiao and the Rise of Popular Sympathy in Republica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中文版參見林郁沁著，陳湘靜譯：《施劍翹復仇案：民國時期公眾同情的興起與影響》（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
- ⑧ Jonathan Schlesinger, *A World Trimmed with Fur: Wild Things, Pristine Places, and the Natural Fringes of Qing Rul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中譯本參見謝健著，關康譯：《帝國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邊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
- ⑨ 參見 Wang Yuanchong, *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王元崇：《中美相遇：大國外交與晚清興衰 (1784-1911)》（上海：文匯出版社，2019）。